

曹锦清 著

如何研究中国

How to Study
China

曹锦清 著

如何研究中国

How to Study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研究中国/曹锦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177-1

I. ①如… II. ①曹… III. ①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8271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如何研究中国

曹锦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78,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77-1/C·357

定价 38.00 元

序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今”和“中—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些许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自信。凭借这份自信，我们

或许也将摆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怨恨与鄙视，它不该替晚清的腐败、积贫积弱及挨打屈辱承担全部的罪责。事实上，指向民族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会给我们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会给我们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从中领会对当代的重要启示。所谓文化创新，究其实就是中西两大文化在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至于“三农”问题，我以为中央 2004 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及随后提出的“二元结构”的两个论断最为重要。我一直想依此对“三农”问题作一系统的理解，但至今仍未成形，近来有些讲演提纲，亦未收入文集内。

近些年来，我很少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懒惰，相反，每有机会我便要到祖国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处书斋，读书每有会意，也欣然命笔，颇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发表，实出于我对“复杂性”怀有日益增强的敬畏之情。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可以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与颓衰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中华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而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微的无奈。虽时时有人请我写点说点什么，几年也结成此文集，然其间有无摸到“大象”，实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尽的我也未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还得观察，还得思索，还得努力写点什么。此中，唯愿己身“不知老之将至”。

曹锦清

2010 年 3 月 5 日

目 录

序 001

中国研究的方法 001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003

“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018

“三农”研究的基本框架 036

“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出路 046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062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067

理解中国——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071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080

重新发现传统 101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103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129

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特质 142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145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149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190

中国转型转向何方 221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223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236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261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279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305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309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318
代跋: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英阶层责任缺失的社会历史分析	325

中国研究的方法

如何研究中国

How to Study
China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各位晚上好。这个题目是邓正来先生出的,很大。给我的时间又非常少,一个小时。讲“论中国研究的方法”,我只能讲讲这些年做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供诸位参考。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中国为方法;第二个想讲中国研究的三个维度;第三,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讲社会事实与社会心态。



第一个问题,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最初是我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新颖,也非常能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当时需要对这个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进行定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弥漫学界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关于应该如何如何的说法听多了,也就烦了。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如何”的判断要以“中国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而要研究中国是什么,就要返回国

* 本文是2008年11月10日作者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

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

当时我们文化研究所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农村，当时我和张乐天老师*就在这个小组；第二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小城镇，1985年前后，费孝通主张“小城镇，大问题”，成立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城镇如何吸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人口的问题；第三个小组是研究当时已经启动的国企改革；第四个小组我们想进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课题——《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然后到1995年，当时我觉得应该把农村研究推到中部去，所以就搞了黄河边的调查，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如何来考察中国当代的事物，当时我提出的是“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这个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从内向外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大家借用这些理论、概念和价值来考察中国的事物。对这样的一个思潮，我当时讲了两句话：第一，大有必要；第二，它内含先天的不足。因此，就有必要辅以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而“由下往上看”，是针对在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政策自上而下地贯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要看农村社会实际变动的情况。

有了上述两个经验，十几年前当看到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来看待中国自身事物的时候，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口号。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以后，对“文革”我们是全盘否定，这也常常影响我们对毛泽东功过的评判。对于一个现代史上的思想巨人，如果仅仅因为他政治上的某些错误，就对他的全部思想加以否定，我们是要犯错误的。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

* 张乐天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是本次演讲的评议嘉宾之一。

风”运动前期的著作,结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的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事物,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因为王明是照搬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本本来套裁中国的经验,要中国完全按照马列原来的本本去做。后来毛泽东把这样的一套做法叫做教条主义,叫做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把这句话加以扩充,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在这里我强调,我对这一判断是加以限定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的,我也可以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的学说。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要重新加以梳理,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这是关于

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含义，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

当然，前面讲了我并不否认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谦虚向西方学习。我们曾经向印度学习佛教，这花了至少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如果从利玛窦开始，至今也不过四百来年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就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也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这个学习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我重点想讲的是，在这个学习运动中，只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当作考察中国事物的一种参考，而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如果把西方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并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近代以来是什么性质？当时我们非常可怜，只有几个西方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或者叫“封建专制社会”。但是秦汉以后尤其宋以后，我们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的流动也是自由的，封建等级制早就消除。这能叫封建社会吗？有人也说不像，那么叫什么社会呢？因为宋以后的商品经济是高度发达的，所以有人讲，中国社会在秦汉以后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但又不像，因为资本主义怎么会搞了两千年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到工业文明呢？所以又找了一个词叫做“前资本主义社会”。那什么叫前资本主义社会呢？因为没有准确的定义，后来说也不对。又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找了一个词，叫“亚细亚社会”，于是兴起了关于中国亚细亚社会的讨论。亚细亚社会是否存在，在印度是不是存在，在中国是不是存在？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中国不符合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社会的条件，比如土地国有制以及底层的村社制在中国都不存在。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传统社会尤其秦汉以后，到底是什么社会，依然处于无名状态。

我再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

政府、被皇上知道了，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要求晋商把从河南低价购买的土地按原价卖给皇上，然后皇上买下来后又重新分配给农民，原来有几亩地现在还是有几亩地。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大量的流民就会产生，整个社会就不得安宁。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古代封建帝王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反而不懂得这个基本的真理呢？

这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指农村的人口向工业和城市流动而言。这个流动有可能是同步的，有可能是不同步的，也可能是超前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的城市化率就高于工业化率，这使得城市近郊产生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里住的是已经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很大一部分处于无业状态。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之所以比较稳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其实是低于工业化率的。我们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个口径是按照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按照这个口径，非农业人口占 32%，农业人口占 68%；而按照城市化率的口径来统计——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以及进城读书的农民子弟以及参军的军人，都纳入城市化率——，这个数值就已达到 44%。如果把城市化率减去这个非农的城市户籍人口，正好相差 12 个百分点。这 12 个百分点就是 1.45 个亿，差不多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样的一种安排是农民进城打工，他的就业是不稳定的，是低薪的，而且也缺乏社会保障。现在城市也没有给广大的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失业保障问题。

近期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今后的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民工的失业达到多少，而且失业的人群往哪里流动，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看，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那不是个缺陷，也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稳定的。当然你从人权的角度说是不是剥夺了农民的很多权利，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目前社会

的成长阶段和城市的财政承担能力。

又譬如说,根据西方的一般经验来说,市场化必然会导向民主化,所以现在有人认为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总的判断来讲,我对此也不会提出过多的异议,确实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象。但是如果把民主化理解为单一的全民选举制度,那么在中国当下要实行 13 亿人选总统的制度,这会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是值得深思的。中国要民主化、法制化,但必须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特点。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西方的经验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可以利用,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以中国为中心就意味着,我们凭靠中国自身的经验有权利修正西方的理论。我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类似于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而有待于诸位的继续努力。

二

讲第二个问题。我这些年来进行了一些调查,在全国各地走,试图进行分类,在不同类型里面分别找到不同的个案来进行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解放前,费孝通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到云南调查,按照经济增长的不同,按照商品化和工业化的不同选了三个村进行调研,然后试图得出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一般结论。这个方法当然还是有些问题。所以我在自己的实证调查当中,对于如何从具体的研究当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也很困惑。后来我看了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好像他也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如何回答呢?他提出“古今中外法”。所以我讲的第二个方法是“古今中外法”。什么叫“古今”呢?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背景里面加以理解。我不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时间的因素有多么重要,但是在

社会科学领域中,时间的因素非常关键。因为历史的时间并不等同于物理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时间的变量就特别地重要。因为事物在时间中发展,在时间中变化。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必须把它放到它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

这里也举几个我在调查研究当中看到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开封包公祠参观,发现有一个碑,上面记载了包公前后 150 年里开封的行政长官的名单以及任职的时间。我一算,平均任职的时间是一年左右,包公在开封任职的时间也是 1 年多一点,就是说任期非常之短。我们知道宋以后,不仅采取了三年一任的短任制,官员实际上都没有满任就转任了,而且还采取了回避制,以家乡为中心 500 华里之内是不能做官的,以防止官员和地方豪强勾结,防止地方权力坐大,这是为强化中央权力所采取的一个举措。因为唐中期以后到五代一直是地方权力过大,地方形成割据,中央权力衰微,所以到宋代就采取了短任制和回避制。

为了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县级官员任期情况,我们调查了十几个县,我只调查县的一、二把手。县级的任期 3 年,但实际任期满 3 年的甚少,平均算下来是 1.7 年,也强调回避制。1994 年县级的任期从 3 年延长到 4 年。中共十七大规定县这一级,包括乡这一级的任期延长到 5 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这样就可以做 10 年。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 5 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这就是说,现在的某些制度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就会发现有时历史的因素在当代并未消失,这个制度仍在运行,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用什么样的名称。

另外关于土地制度,1982 年全国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起源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耕作制度,也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之前是土改,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再往前是土地私有制。宋以后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流转的加快,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士大夫们对此有大量的议论,一种议论就是要限制土地兼并,一种